



历史比较下的上古汉语构拟*

——白一平、沙加尔(2014)体系述评

马 坤

提要 白一平、沙加尔(2014)利用了近年来汉语方言、民族语借词和古文字领域的新成果,更为系统地将历史比较法引入上古汉语构拟当中。我们结合两位学者之前所提出的拟音方案,以介绍新系统中的各项重要进展,并简要评价当中的某些问题。

关键词 白-沙(2014) 上古音 构拟 历史比较法

1. 引言

美国密歇根大学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教授和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沙加尔(Laurent Sagart)教授合著的新书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已于 2014 年 9 月出版^①。该书面世之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美国语言学会 2016 年度“布隆菲尔德图书奖”(Leonard Bloomfield Book Award)。两位学者之前都发表过上古音构拟方面的专著: Baxter(1992)的特色在于韵部构拟,即在数项音变假说基础上对传统韵部再分类并提出了“六元音”方案; Sagart(1999)主要利用谐声、词族以及民族语中的早期借词以探究上古汉语的词缀和声母系统。近十几年来,随着汉语方言、民族语研究的推进以及出土简帛文献的整理发表,上古音韵材料不断得到了充实。期间,两位学者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早先的方案进行修订,白-沙(2014)正是在这一基础下诞生的。本文主要结合 Baxter(1992)及 Sagart(1999),根据我们的理解,来介绍白-沙(2014)所依据的新材料、新方法,以及拟音系统中的各项重要改进。

白-沙(2014)共六章,其安排大致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介绍研究思路。白-沙(2014:5)主张古音构拟应当遵循“假说—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即从有限的材料中推演出音变假说,使拟音系统具备一定预测能力,并根据新材料进行检验或调整。

第二章介绍新材料。主要包括出土简帛文献、古方言以及民族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三类。它们或为汉人所用或为外族人所借,本质上都属于汉语内部材料(白-沙,2014:40-41)。

第三章介绍了拟音体系的总体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与声母和前置结构相关的音变假说;韵部构拟上的改动;上古汉语词根的概貌;词缀的某些形态功能。

第四章为该书的核心部分。本章综合运用方言和借词两类材料,系统地将历史比较法运

* 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1 批面上资助项目(No.2017M 610560)、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NO. 2016YBYY077)的资助。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沙加尔先生的帮助,初稿完成后曾得到潘悟云先生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① William H. Baxter 和 Laurent Sagart(2014)以下简称白-沙(2014)。



用到声母和前置结构的构拟中。此外,还从谐声和词族材料出发,增加了一套小舌音声母。

第五章为韵部系统的构拟。新系统沿用了 Baxter(1992)的“六元音”方案,但在介音、韵尾、后置韵尾(post-coda)等位置皆有所改动。较为显著的有两项:一是取消了三等介音(*-j-),用咽化作用(pharyngealization)解释三等与一、二、四等的区别;二是增加了一套*-r韵尾以解释某些“阴阳对转”现象。

第六章为总论。归纳了上古汉语的音韵特点,交代了新系统中存在的疑点,指出了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2. 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突破

2.1 古文字

在早先的研究中,Baxter(1992)和 Sagart(1999)都比较重视音韵材料的可靠性问题。指出传世文献可能经后人删改,也可能出现版本错讹。近十余年来,古文字学界陆续整理和公布了大批简帛文献,其著录时代集中在战国至西汉之间,内容包括遣册、卜筮祭祷记录、司法行政文书、书籍等。当中的异文、谐声、通假和韵文等对于研究上古音韵具有重要作用。白-沙(2014)把通假材料纳入广义的谐声范畴,将谐声关系分为“共时的声符互用(interchange)”和“历时的声符替换(substitution)”两类,以区分当中的时代和地域层次:前者可用来订正或补充谐声系列,后者可用来推测语音演变。

2.2 民族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

Sagart(1999:8)认为,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在远古时期是多民族杂居的,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包括壮侗语、苗瑶语、南亚语、藏缅语等。战国末年,随着汉人南迁,汉语同民族语之间发生了持久而深刻的接触。受强势语言的影响,这些语言中存在多个历史层次的汉语借词。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曾利用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以考察汉语声调的起源,由此发展出*-s和*-ʔ韵尾理论,显示出这类材料在上古汉语研究中的潜力。李妍周和沙加尔(1998/2013)提出了借词的“一致性原则(principle of coherence)”,以区分借词的历史层次。后来,该理论为更多学者所采纳,被运用到对白语、水语、哈尼语、苗语和拉珈语等借词研究之中,逐渐积累了一批早期汉语借词材料(参看蓝庆元、向柏霖,2013)。

由于早期借词和同源词混而难分,白-沙(2014)一方面排除了藏缅语中的共同词汇,一方面剔除了系属不明的民族语借词(如:白语等),而主要利用了越南语、壮侗语、苗瑶语中的汉语借词^②。上述三种语言早先都存在带前置成分(presyllables)的音节结构,它被认为是许多东亚语言单音节化的起点(米可,2013)。这三种语言大约在战国时期开始同汉语接触,故可以利用当中的早期借词层以重建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

1) 古越南语中的前置成分已经消失,可以通过同语支的芒语(Mu'ò'ng)、他翁语(Thavung)、鲁克语(Ruc)、萨克语(Sách)等构拟出来。根据语音对应关系,越南语中的浊擦音

^② 越南语的系属较为明确(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越芒语支),而苗瑶语、壮侗语则存在争议。据沙加尔介绍(2015,私人交流):对于苗瑶语,西方学者一般将其视为独立的语系;对于壮侗语,他本人主张归入南岛语系(Austronesian),并且认为汉语、藏缅语和南岛语之间具有同源关系,构成“汉藏南岛语系”(Sino-Tibetan-Austronesian)。白-沙(2014:40-41)认为,由于历史分化过程不明确,加之受早期汉语借词的影响,藏缅语材料暂时只能作为类型学证据,而不能用来直接“证明”具体的上古汉语构拟成分。

声首对应鲁克语等语言中带前置成分的音节。可以首先根据汉-越语声调对应关系区分出早期借词层,再利用当中的浊擦音字来考察上古汉语的前置结构(白-沙,2014:94)。

2) 根据目前的构拟,古苗瑶语中的响音有三套,包括清响音、浊响音和带先喉塞音的浊响音;塞音和塞擦音也有三套,包括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浊音,并且它们都可以带鼻冠音。苗瑶语借词对于判定汉语“清浊别义”现象中的词缀形式具有重要意义(Sagart & Baxter,2012;白-沙,2014:96)。

3) 壮侗语族拉珈语前置成分的简化过程较特殊:固有词汇和早期借词的前置塞音往往保留而主要音节的辅音声首发生脱落;当辅音声首为鼻音时,它还会使主要元音发生鼻化。这对于考察原始闽语中清响音声母的分化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白-沙,2014:91-92)。

2.3 汉语方言中的存古现象

自高本汉以来,学者普遍认为除闽方言之外,现代汉语方言均直接来源于《切韵》音系,这也导致在以往的上古音构拟中未能真正地运用历史比较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罗杰瑞(Jerry Norman)对闽方言的研究表明原始闽语具有复杂的声母系统: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有六套,包括送气/不送气清音、送气/不送气浊音以及清、浊两套软化声母(softened initials),响音声母也有清、浊两套。这些特殊声类逐渐为古音学家所重视:

表1 以往学者对原始闽语特殊声类的解释(以舌根音声母为例)

原始闽语声类	中古音	蒲立本 (1973)	白保罗 (1976,1987)	斯塔罗斯金 (1989)	沙加尔 (1999)
送气浊音(*g ^h -)	g-	*g-	*g-	*gh-	—
不送气浊音(*g-)	g-	*fi ^h g-	C+g-	*g-	—
软化清音(*-k-)	k-	—	*s-k-	—	带轻重格前缀(*Cə-)
软化浊音(*-g-)	g-	—	*s-g-	—	带轻重格前缀(*Cə-)
清响音(*hl-)	l-	—	—	*hl-	—

近年来,学者陆续发现其他方言中也类似的存古现象,包括客家方言和湘西瓦乡话等。白-沙(2014)认为,它们是由上古汉语直接演变而来,反映了《切韵》之前语音特征。在新材料的基础上,白-沙(2014:86-87,91)为原始闽语的特殊声类构拟了以下来源:

- 1) 软化清/浊声母来源于上古松散结合(loosely attached)的前置结构;
- 2) 浊送气声母来源于上古紧致结合(tightly attached)的前置结构(除*N-以外);
- 3) 清响音声母来源于上古“前置清塞音+浊响音”结构。

2.4 历史比较法的系统运用

根据历史比较的基本原则,原始语拟测应当建立在后代亲属语或方言的音类比较之上。而以往的古音构拟一般采用所谓“内部比较法”:首先利用上古韵文、谐声等材料划分音类,再以《切韵》系统为参照确定音类对应关系,最后依据语音变化的普遍规律拟出音值。在上述新材料的基础上,白-沙(2014)系统地历史比较法引入前置成分和声母系统的构拟中。

白-沙(2014)认为:古越芒语、古侗台语、古苗瑶语同汉语接触的时代上限约在上古晚期,早期借词中的音节结构很可能直接反映了上古汉语的情况;原始闽语的分化稍晚,约在西汉以后,其特殊声类是由前置成分简化后形成的。单类的民族语借词或方言材料在上古音构拟中存在局限性。例如,通过古苗瑶语、越南语借词可以得知前置鼻音或塞音的存在,但无法判断它们的结合类型(松散/紧致结合);原始闽语的声类可以提示前置成分的存在及其结合类型,

却无法判断其具体音值。故在具体操作中,必须将比较材料有机结合:

表2 比较材料的综合利用^③(转引自白-沙,2014:98,表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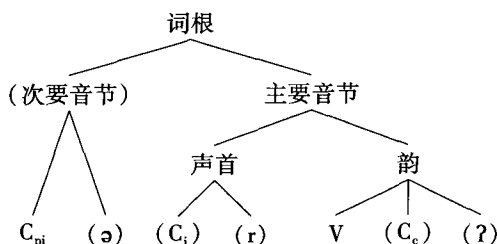
中古音	原始闽语	越南语	古苗瑶语(带鼻冠音)	古苗瑶语(不带鼻冠音)
p-	* p-	b-[β] H	—	OC * p(ʰ)-
p-	* p-	v-[v] H	—	OC * C.p(ʰ)-
p-	* -p-	v-[v] H	OC * mǝ.p(ʰ)-	OC * Cǝ.p(ʰ)-
ph-	* ph-	p ^h -[f] H	OC * mǝ.p ^h (ʰ)-	OC * p ^h (ʰ)-, * C.p ^h (ʰ)-, * Cǝ.p ^h (ʰ)-
b-	* b-	b-[β] L	OC * N.p(ʰ)-, * N.p ^h (ʰ)-, * N.b(ʰ)-	OC * b(ʰ)-
b-	* bh-	v-[v] L	OC * m.p(ʰ)-, * m.p ^h (ʰ)-, * m.b(ʰ)-	OC * C.b(ʰ)-
b-	* -b-	v-[v] L	OC * mǝ.b(ʰ)-	OC * Cǝ.b(ʰ)-

我们将在3.1节介绍前置成分的具体构拟思路,兹不赘述。据沙加尔先生介绍(2014,私人交流),他与白一平先生合作建立了一部数据库,该库具有以下特点:以高本汉《汉文典》(GSR)的收字及谐声系联为基础,并根据古文字等材料进行调整;收罗了上述几种民族语借词和古方言材料;参考训诂典籍的释义,建立起词族系统。总之,将民族语借词、古方言同文献材料(特别是古文字)有机结合,是白-沙(2014)体系的根基,而历史比较法的系统运用则是该体系的特色。

3. 白-沙(2014)体系中的几项重要改进

在介绍各项改进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白-沙(2014)对上古汉语词根的划分。该书认为,词根(root)可以由主要音节(major syllable)和次要音节(minor syllable)构成^④。主要音节可划分为声首(onset)和韵(rhyme)两部分,前者由声母(C_i initial)和介音(medial * -r-)构成,后者由主要元音(vowel nucleus)、韵尾(coda)和后置韵尾(postcoda)构成。次要音节由前置辅音(preinitial consonant)和前置元音(preinitial vowel)构成。词根结构可概括为下表3。

表3 词根结构^⑤(转引自白-沙,2014:53,表3.3)



③ “越南语”栏中的H表示阴调(high register tone),L表示阳调(low register tone)。按照是否带鼻冠音,“原始苗瑶语”可分为两栏,当中的OC(Old Chinese)即为综合各类材料而得出的上古汉语声母形式。

④ 这种音节结构在东亚语言中比较常见,有时也称作“一个半音节(sesquisyllabic structure)”。但根据沙加尔的观点(2015,私人交流),这一提法存在模糊性:一方面,不能体现前置成分在韵上的特点,即它在韵脚位置实际上只能算一个音节,两个“一个半音节”也不能简单地与“三个音节”划上等号;另一方面,前置成分可能带或不带混元音(C-,Cǝ-),称“一个半音节”不能反映这一差异。有鉴于此,白-沙(2014)主张直接称作“带前置成分的音节(words with presyllables)”。

⑤ 表中凡带括号的成分都是非必要的。

前置元音(*ə)、介音(*-r-)和词尾(*-ʔ)位置上的成分都是固定的,前置辅音(C_{pr}-)可以由*p-, *t-, *k-, *r-, *s-, *m-, *N-充当,声母(C_i-)可以由除*j和*w以外的辅音充当,主要元音可以由“六元音”(*i, *ə, *u, *e, *a, *o)充当,韵尾可以由*-m, *-n, *-ŋ, *-r, *-j, *-w, *-p, *-t, *-k, *-wk 充当。白-沙(2014)还构拟了一套词缀系统,包括前缀(prefix)、中缀(infix)和后缀(suffix)。前缀主要有以下五类:*N-, *m-, *s-, *t-, *k-,中缀只有一类(*<r>,用尖括号与二等介音*-r-相区分),后缀(*-s)具有多种形态功能。

与Baxter(1992)和Sagart(1999)相较,新系统对上述某些位置的构拟发生了较大变化。下面我们按照上古音节的顺序,对这些改进做具体介绍。

3.1 前置音节

Sagart(1999:21)区分了“融合型(fused)”和“前轻后重型(iambic)”两种音节结构,新系统沿用了这一观点,但分别改称为“紧致结合(tightly attached)”及“松散结合(loosely attached)”,并承认前置音节既可能是前缀(prefix),又可能是词根的一部分。所谓“紧致结合”,指辅音声首直接跟在前置辅音之后从而形成复辅音(如:*C-p-或*C.p-);所谓“松散结合”,指辅音声首与前置辅音之间插入混元音*ə(如:*Cə-p-或*Cə.p-)。由于上古汉语形态比较匮乏,词缀的功能往往不够明确,故有时前缀与词根混而难分。对于形态功能比较明确的前缀,白-沙(2014)用“-”与词根隔开,其余情况统一用“·”标识。

民族语借词和古方言是历史比较的重要材料:清响音声母、前置鼻音主要结合苗瑶语借词和闽方言来构拟,前置塞音主要结合越南语、拉珈语借词和闽方言来做构拟。通过历史比较所得到的前置成分有时又可以同谐声或词族系列互证。以前置塞音为例:

表4 前置塞音的构拟,引自白-沙(2014:97,表4.23)

	中古音	上古音	拉珈语	越南语	鲁克语	原始闽语
箴	<i>tsyim</i>	* t.[k]əm	them 1	găm [ɣam A1]	—	* tʂ
纸	<i>tsyex</i>	* k.teʔ	khjei 3	giáy [zai B1]	kəcáy	* tʂ
贼	<i>dzok</i>	* k.dzʰək	kjak 8	giəc [zak D2]	kəcák	* dzh
床	<i>dzrjang</i>	* k.dzraŋ	—	giu'ò'ng [zuŋ A2]	kəci:ŋ	* dzh

参照2.2节,在拉珈语借词中,“贼”为阳调不送气清音(kjak 8),通过壮侗语族内部的比较得知,它原先为“前置清塞音+浊音声首”结构,其音变过程为:*k-dz->g-dz-(同化)>g-(辅音声首脱落)>k-阳调(清化);在越南语借词中,“贼”带有浊擦音声首([zak D2]),通过越芒语支内部比较得知,它原本存在前置辅音,参照鲁克语的情形(kəcák),可推测前置成分为舌根塞音;在原始闽语中,“贼”字为浊送气声母(*dzh-),可推测前置成分是紧致结合的。综合以上材料,白-沙(2014)将“贼”字拟作*k.dzʰək > dzok。

“箴”、“纸”、“床”等字可根据类似的手段进行构拟。在甲骨文中,“箴(针)”字从“十”得声(裘锡圭,2004);在帛书本《五行》中,《曹风·鸛鸣》“其子七兮”引作“其子七氏”;此外,“氏”声系中还有舌根音字“祗”、“痲”、“軫”等(GSR,867)。这类文献材料可以进一步印证前置成分的构拟,具体论述参看白-沙(2014:154,160-161)。

在白-沙(2014)中,比较材料和文献材料的重要性是相当的。有时前置成分在谐声或词族中留下痕迹,而在借词或古方言中则否,即可以依据文献材料做出构拟,反之亦然。例如,《说文·人部》:“仁,亲也。从人从二。忝,古文仁从千心。𠂇,古文仁或从尸。”据此,“仁”字

古文有“忝”和“𠂔”两种形体,它们都属会意字。而在楚系简帛文献中,“仁”往往写作“𠂔”、“忝”或“忝”。例如:

- (1) 口之仁,孔子之𠂔(司)以礼。(《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帛》,简5)
- (2) 忠,忝(仁)之实也。(“郭店简”《忠信之道》,简8)
- (3) 故大道𠂔(廢),安(焉)有𠂔(仁)义?(“郭店简”《老子丙》,简3)
- (4) 忝(愛)𠂔(親)𠂔(忘)𠂔(賢),忝(仁)而未义也。(“郭店简”《唐虞之道》,简38)

从上述材料来看,“身”、“千”、“人”等应当视作声符^⑥,《说文》对“仁”字的分析值得怀疑。类似地,“信”字《说文》分析为“从人从言,会意”,但其古文同样有从“身”、从“千”、从“人”的写法,也应当视作谐声字。据此,白-沙(2014)为该系列中的心母和清母字构拟了前置辅音 *s-:

- | | |
|---------------------------------|---------------------|
| (5) 身 *ni[ŋ] > syin | 仁 *niŋ > nyin |
| 千 *sŋ ^f i[ŋ] > tshen | 信 *s-mi[ŋ]-s > sinH |
| 人 *ni[ŋ] > nyin | 言 *ŋan > ŋjon |

3.2 小舌声母

白-沙(2014)在声母系统上最显著变化即增加了一套小舌音(uvulars)。牙、喉音在谐声材料中的接触情况可分为两类:牙音与喉音之间的交涉(如:公声有翁、瓮,昌声有娟、捐),牙、喉音一道同其他部位接触。后者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一是与章组接触(如:ㄐ声有收、叫,咸声有箴、箴),二是与端、知组接触(如:贵声有隳、穢,希声有𦉳、緝),三是与精、庄组接触(如:井声有阱、穿,惠声有穗、總),四是与唇音接触(如:己声有配、妃,粤声有聘、娉)。现代学者针对上述第二类情形,陆续提出了复辅音、* -r-介音、前置音节等多种构拟方案,该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参看高本汉,1923;雅洪托夫,1960;白-沙,2014)。

对于上述第一类情形(即牙、喉之间的交涉),传统古音学家一般认为牙、喉古音本为一类,章太炎甚至提出“喉、牙足以衍百音,百音亦终复喉、牙”之论^⑦。从谐声的角度看,牙、喉声母的构拟主要有以下难题:1)如何解释擦音和塞音互谐现象;2)如何解释以母(喻四)与不同部位声纽(包括舌头、舌根等)的接触;3)如何确定匣母与群、云(喻三)之间的互补关系。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以往的构拟方案:

高本汉(1923)以《康熙字典》收字为材料,认为匣母同喻母(包括喻三、喻四)的谐声行为类似,即常与塞音接触而不常与擦音接触。他一方面将匣母、喻三、喻四改拟为不送气的浊音塞音,一方面沿用了影、晓二纽的中古发音方法。董同龢(1948)发现高氏的材料存在缺陷,即晓、匣二纽在《说文》谐声中实际上是经常相谐的。他维持了匣母擦音的构拟(*y-),并采纳了曾运乾“喻三归匣”的理论,将匣母改配喻三。李方桂(1971)的改进为:1)取消了高氏的浊送气声母,认为上古汉语全浊声母不存在送气/不送气对立;2)增加了一套圆唇舌根声母(*k^w-, *kh^w-, *g^w-, *ng^w-);3)将喻四改拟为 *r-;4)使匣母兼配喻三和群母。王力(1987)对谐声材料在古声纽研究中的作用有所怀疑,除喻三和喻四外,他大致沿用了牙喉音声纽的中古拟音。上述诸家的构拟方案可归纳如下:

^⑥ 参看荆门市博物馆(1998)《郭店楚墓竹简》第121页裘锡圭按语。白-沙(2014)封面的“仁”(𠂔)字即取从心身声的写法:𠂔。

^⑦ 参看戴震《转语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字母条》以及章太炎《国故论衡·古双声说》。

表5 以往学者对牙、喉音声母的构拟

	高本汉(1923)	董同龢(1948)	李方桂(1971)	王力(1987)
见(k-)	* k-	* k-	* k-, * k ^w -	* k-
溪(kh-)	* kh-	* k'-	* k'-, * k' ^w -	* k'-
群(g-)	* g'-(三等)	* g'-	* g-+j-, * g ^w -+ji-(三等)	* g'-
疑(ng-)	* ng-	* ng-	* ng-, * ng ^w -	* ng-
影(')	* ʔ-	* ʔ-	* ·-, * · ^w -	* 〇-
晓(x-)	* ɕ-, * ɕ ^m -	* ɕ-, * m-	* h-, * h ^w -, * hm-, * hn-, * hng-, * hng ^w -	* x-
匣(h-)	* g'-(一、二、四等)	* ɣ-(一、二、四等)	* g-, * g ^w - (一、二、四等)	* ɣ-(一、二、四等)
喻三(hj-)	* g-, * d-	* ɣ-(三等)	* g ^w -(三等)	* ɣ-(三等)
喻四(y-)	* g-, * d-, * z-, * b-	* g-, * d-	* r-, * grj-, * brj-	* d-

邵荣芬(1991)对匣母的谐声行为做了划分,即根据它与塞音或擦音的接触分别拟作 * g-和 * h-。Baxter(1992:209-210)也将匣母分为塞音和擦音两类,但出发点有所不同:他认为部分喻三的开口字不能视为例外(拟作 * fi-),当匣母与之相谐时便拟为擦音 * fi-。然而,晓母除了与匣母(擦音类)相谐之外还常与见组塞音接触,上述方案对此仍缺乏解释力。

此后,部分学者将眼光转移到民族语借词、对音等材料上。潘悟云(1997)发现在民族语借词中,汉语的牙喉音声母往往与小舌音相对应,主张引入一套小舌塞音:

$$* q- > '-; * qh- > x-; * gj- > ɣj-; * G- > ɣ-$$

不送气清塞音 * q-变为中古影母,送气清塞音 * q^h-变为晓母,三等浊塞音 * G-变为云母,一、二、四等的 * G-变为匣母。如此一来,牙、喉音之间发音方法的接触就限制在了塞音之内。曾晓渝(2003)在水语的早期汉语借词层中也观察到见母存在小舌音变体(* k- : * G-):二者的分布以韵母的等第为条件,即一、二、四等为一类,三等为一类^⑧。Sagart 和 Baxter(2009)接受了潘悟云(1997)的小舌音构拟,他们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更合理地解释牙、喉音的谐声。该文在潘悟云(1997)的基础上作了以下改进:

3.2.1 区别圆唇/不圆唇两类小舌声母

潘悟云(1997)并未将圆唇声母理论运用到小舌音中,他认为上古三等的 * G-部位靠后,容易产生一个过渡性的-w-,故造成中古云母字多为合口。他还假定上古匣母(一、二、四等的 * G-)、影母(* q-)、晓母(* q^h-)向喉音转变的时间较早,故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Sagart 和 Baxter(2009)发现,小舌与舌根之间的接触以及小舌音内部的接触都存在开合口分组的趋势,于是在系统中增加了一套圆唇小舌音(labiuvulars):

- (6) * q-, * q^w-, * q^f-, * q^{wf}- 对应中古影母
 * q^h-, * q^{hw}-, * q^{hf}-, * q^{hwf}- 对应晓母或书母
 * G^f-, * G^{wf}- 对应匣母
 * G- 对应喻四
 * G^w- 紧接前元音(* i 或 * e)时对应喻四,其余情况对应喻三

^⑧ 这类分布现象在白-沙(2014)中被分析为咽化作用(pharyngealization),详见下文3.3.1。

3.2.2 为以母构拟小舌音来源

以母(喻四)的谐声行为可分两类:一类与舌音端、知、章组接触,一类与来母及唇、牙、喉音接触。以往各家的构拟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于用复辅音来解释后一类现象。以“與”系列为例:

表 6 以往各家对“與”、“舉”谐声的构拟

	中古音	白一平(1992)	沙加(1999)	潘悟云(2000)
與	yoX	*ljaʔ	* ^b laʔ	*lä
舉	kjoX	*k(r/l)jaʔ	* ^b k-laʔ	*klä

Sagart 和 Baxter(2009)承认这类带流音的复声母(如:舉 *^bk-laʔ)在藏缅语关系词中很难找到对应形式。在接受了小舌音的构拟之后,他们将这类以母改拟为 *g-,对应的舌根音改拟为“前置塞音+小舌音声母”结构:

(7) 與 *Gaʔ-s > yoH 舉 *C.qaʔ > kjoX

3.2.3 为喉音以外的声母构拟小舌音来源

对于舌根音与小舌声母的谐声接触,Sagart 和 Baxter(2009)不再以发音部位接近来解释,而是根据“同一谐声或词族系列声母相同”的原则,为当中的舌根声母构拟了松散结合的“前置塞音+小舌声母”结构。白-沙(2014)又根据原始闽语,将前置成分拟改为“紧致结合”。例如,“镜”、“景”、“影”属同一词族^⑨,应当具有相同的声母,白-沙(2014:168)的构拟如下:

(8) 景 *C.qraŋʔ > kjaengX
 镜 *C.qraŋ-s > kjaengH
 影 *qraŋʔ > 'jaengX

在越南语的早期借词中,“镜”字具有浊擦音声首(g'o'ng[ɣʷɪaŋ A1]),表明它原本存在前置成分(参见2.2节);在原始闽语中,“镜”字带有不送气清声母(*k-),表明前置成分当为紧致结合(而非松散结合,否则应当对应软化声母 *k-)。

对于心、邪、疑母等与小舌音的接触,Sagart 和 Baxter(2009)也为它们构拟了小舌音来源:

(9) 心 s- < *s-q^h-, *s-q^{wh}-, *s-q^{hʷ}-, *s-q^{hwʷ}-
 邪 z- < *s-G-, *s-G^w-
 疑 ng- < *m-/ *N- + 小舌音

3.2.4 为影母保留喉塞音来源

Sagart 和 Baxter(2009)将影母一律拟作小舌音,而白-沙(2014:44)主张为部分影母字保留喉塞音(*ʔ-)的来源。他们从谐声材料出发,将影母分为两类:凡影母自谐者拟作喉塞音(*ʔ(ʰ)-),其余的情况则拟作小舌音(*q(ʷ)-)。传统上古声纽研究侧重于《广韵》声类的归并,有“古无轻唇及舌上”“娘日归泥”“照二归精,照三归端”“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等论断,而对于声纽的“离析”有所欠缺。自高本汉著、赵元任译(1923/2002),董同龢(1948)以来,学者针对这一状况陆续作了改进。对上古声纽进行离析,要求我们在谐声系联的基础上考察各声符之间是否存在分组趋势。除影纽之外,白-沙(2014)还对疑纽、喻四等构拟了多个来源。我们认为,具体方案还有待于古文字材料的检验或修订。

^⑨ 《释名·释首饰》“镜,景也,言有光景也”,《说文·金部》“镜,景也”,皆用声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此以叠韵为训也”。根据传统训诂学的观点,“镜”“景”二字音近义通。

3.3 韵部系统

同 Baxter(1992)的韵部系统相比,白-沙(2014)在主元音上的变化较小,而介音、韵尾、词尾等位置则有较大改动。在阐述各项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两个音变假说,即“唇化元音假说(rounded vowel hypothesis)”和“前元音假说(front vowel hypothesis)”。前者由雅洪托夫(Jaxontov,1960)提出,指中古合口介音(-w-)部分由圆唇软腭声母或圆唇喉音声母(如:*k^w-,*ʔ^w-等)变来,部分由圆唇主要元音(*u或*o)分裂(diphthongize)而来;后者由 Baxter(1992)提出,指中古和上古一、四等韵的差别在于主元音的舌位前后,而非介音的有无。这两种假说与介音、主元音甚至声母构拟都有关系。

3.3.1 介音系统的变化

Baxter(1992)根据“唇化元音假说”取消了高本汉(1923)的上古合口介音(*-w-),根据“前元音假说”取消了高氏的四等介音(强元音性的*-i-),但保留了三等介音(*-j-)。此外,他还增加了二等*-r-介音以及*-l-介音。于是,该系统共有三种介音:*-j-,*-r-,*-l-。

对于三等介音*-j-,一方面在《诗》韵、谐声、借词和对音等材料中都难以发现其痕迹,另一方面还会给上古拟音造成诸多不便,于是不少学者对它产生了怀疑并提出多种替代方案。Sagart(1999)采纳了 Norman(1994)的“咽化理论”(pharyngealization theory),认为上古一、二、四等(type A)为咽化音节(pharyngealized syllables),声母带有咽化标记(*^ʕ),发音部位内缩;三等(type B)字不带咽化标记,声母发音部位相对靠前。当咽化特征趋于消亡时,type B音节中的声母容易受邻近元音影响而发生腭化(palatalization),继而产生-j-介音。Sagart(1999)主张取消上古的三等介音(*-j-),并认为 Baxter(1992)*-l-介音也不能成立。于是,该系统只剩下了二等介音(*-r-)。白-沙(2014)基本沿用了 Sagart(1999)的方案。此外,该书还利用汉代的古读材料,对咽化音节的特征做了考察(白-沙,2014:73)。

3.3.2 “六元音”体系的变化

以往学者的韵部构拟大致以清人的分部结论为基础。为解释上古韵部向《切韵》韵类的演变,各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遵循“同一韵部主要元音相同”的原则,为同韵部的字构拟相同的主要元音,而又在介音上人为地制造区分;二是降低主元音上的标准,为某些复杂的韵部构拟存在长短、松紧差异的主元音。这两种方案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各类韵尾所带的主要元音种类多寡不均,导致拟音系统的平衡对称性较差。例如,根据王力(1987:60-71),收*-ŋ的东、冬、阳、蒸、耕五部以及对应的阴(收*-Ø)、入声(收*-k)诸部可以带5种主元音(*a,*o,*e,*ə,*u);收*-n的真、文、元三部以及对应的阴(收*-i)、入声(收*-t)诸部可以带3种主元音(*ə,*a,*e);收*-m的侵、覃二部以及对应的入声(收*-p)诸部可以带2种主元音(*ə,*a);宵、药二部则带有独特的主元音*ɔ。

依据“唇化元音假说”、“前元音假说”、“*-r-介音假说”,Baxter(1992)一方面简化了介音系统,另一方面为某些传统韵部构拟了数个主元音(即划分为相应的数个小类),提出了“六元音”方案^⑩。该体系扩展了圆唇元音(*o,*u)和前元音(*i,*e)的范围,使“六元音”(*i,

^⑩ 据白-沙(2014:393)介绍,包拟古曾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从事过“六元音”方面的研究,白一平先生在其影响下,完成了这一构想。与此同时,斯塔罗斯金、郑张尚芳两位学者也先后提出了“六元音”体系。由于时代限制,他们对对方的研究互不了解,后来才发现三家的构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可谓“闭门造车,出而合辙”。

*i, *u, *e, *a, *o) 的分布趋于平均(详表7)。上述音变假说是通过音位理论得到的(即考察韵类的分布特征)，“再分类”之后难免出现合韵现象，故对混用频率进行统计以考察韵部之间的交涉就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卫风·氓》六章(58.6A)以“怨、岸、泮、宴、晏、旦、反”为一韵，属传统的元部，以往诸家为它们构拟了相同或相近的主要元音。而在“六元音”系统中，元部被分成了三类，分别带 *e, *a, *o 三种主要元音，它们恰好在上述韵段中相混：

表7 传统元部“再分类”后的交涉现象

	怨	岸	泮	宴	晏	旦	反
中古音	'jwonH	nganH	phanH	'enH	'aenH	tanH	pjonX
王力①	* iuan	* ngan	* phuan	* yan	* ean	* tan	* piuan
白-沙	* ʔor-s	* ŋ ^s ar-s	* p ^{hs} an-s	* ʔ ^s en-s	* ʔ ^s <r>an-s	* t ^s an-s	* Cə.panʔ

Baxter(1992)运用数理统计的手段对《诗经》用韵做了全面考察，他发现韵部间的混用概率较小($P < 0.05$)，“六元音”构拟是可以成立的。实际上，某些“例外押韵”是由于文献传抄所导致，我们可以利用出土文献做进一步验证(详下文第4节)。由于唇音韵尾收字不多，入韵的情况更少，加之受异化作用影响，原先的圆唇元音(*u, *o)容易产生音变。它们难以凭借韵文和谐声材料进行构拟，也无法进行概率统计。对此，Baxter(1992)依据语音系统的平衡性原理，参照侵-冬、侵-蒸等合韵现象进行拟测，认为唇音韵尾前同样能完整地出现“六元音”。

在Baxter(1992)的基础上，白-沙(2014)对主元音作了两点调整：一是，*i和*ɨ形近易混，故将后者改写为央元音*ə；二是，使“六元音”可以完整地出现在新增加的*-r韵尾前(详3.3.3)。白-沙(2014)主元音的构拟情况可概括如下：

表8 白-沙(2014)的韵部“再分类”及其主要元音

	* a	* ə	* e	* o	* u	* i
* -∅	鱼	之	支	侯	幽	—
* -k	铎	职	锡	屋	觉	(质锡)
* -ŋ	阳	蒸	耕	东	冬	(真耕)
* -j	歌	微	支	歌	微	脂
* -t	月	物	月	月	物	质
* -n	元	文	元	元	文	真
* -r	(歌元)	(微文)	(支元)	(歌元)	(微文)	(脂真)
* -w	宵	—	宵	—	—	宵
* -wk	药	—	药	—	—	药
* -m	谈	侵	谈	谈	(侵冬)	侵
* -p	叶	缉	叶	叶	缉	缉

3.3.3 *-r 韵尾

古韵学家对脂、微、歌及其对应的阳、入声诸部的划分和搭配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提出了“支、脂、之三分”、“真、淳分立”、“古异平同入”等理论，在入声分配方面，段氏发现“质、术二类有别”，但却将质类(质、栉、屑三韵)隶于阳声真部，将术类隶于阴声脂部，戴震批评为“或隶彼或隶此”(《声类表·卷首·答段若膺论韵书》)。后来，戴震、江有

① 依据王力(2014)《诗经韵读》，中华书局，第172-173页。

诰、王念孙等人陆续提出了改进方案:戴氏重视韵部的系统性,他认为既然阳声有真、淳、文三类,对应的阴声和入声亦当分为三类;实际上,他主张真、淳当合,《声类表》以安-遏-霭、殷-乙-衣相配。江、王二氏主张真、淳分部,且都独立出入声祭(月)部,王念孙更分出入声至(质)部^⑫。王力(1989[1963])进一步独立出阴声微部、入声物部,形成了较为严整的配合关系:脂-质-真、微-物-文、歌-月-元。

在古音构拟中,如何解释这种“对转”现象又成了一大难题。高本汉(1940)以声调为界,将王念孙的第十三部(王力的脂、微部)二分:平、上声为一类,高氏认为它们常与阳声接触,拟作收 * -r;去声为一类,高氏认为它们常与入声接触,拟作收 * -d。对于歌部,高氏按其是否与阳声相接触,分别拟作收 * -r或收 * -∅。董同龢(1948)、李方桂(1971)等对上述做了修订,都主张为脂、微、歌诸部构拟浊音辅音韵尾(如: * -d, * -l等)。

王力(1987)和 Baxter(1992)都反对浊辅音韵尾的构拟^⑬,但改进方案有所不同:王力先生认为古有声调(分平、上、短入、长入四类),与入声相接触的去声字来自上古的“长入”,它们不带塞音韵尾;白一平先生认为古无声调,他采纳了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的学说,认为去声来源于 * -s词尾。与入声接触的阴声字主要限于去声,构拟“长入”或“ * -s词尾”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分布特征,但对于阴-阳声的交涉仍无能为力。

斯塔罗斯金(1989)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将相接触的阴、阳声字一并拟作收 * -r。他认为 * -r韵尾一般变为中古的-n韵尾,只在某些古方言中才变为 * -j韵尾。白-沙(2014)采纳了这一学说,在新系统中增加了 * -r韵尾,它可以完整地带上“六元音”。例如:

(9) 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左传·僖五年》)

依韵例,本段以“晨、辰、振、旂、贲、焯、军、奔”为一韵^⑭,各家的构拟如下:

表9 各家对“文-微对转”的处理

	晨	辰	振	旂	贲	焯	军	奔
中古音	dzyin	dzyin	tsyin	gɨj	pwon	thwon	kjun	pwon
高本汉	* dʒiən	* dʒiən	* tʃiən	* gʷiər	* pwən	* tʷən	* kiwən	* pwən
王力 ^⑮	* zʃiən	* zʃiən	* tʃiən	* gʷi	* puən	* tʷən	* kiwən	* puən
白一平	* dʒin	* dʒin	* tʃin	* gij	* pun	* thun	* kjun	* pun
白-沙	* dər	* [d]ər	* tər	* C.gər	* pʷur > * pʷər	* tʰur > * tʰwər	[k]ʷər	* pʷur > * pʷər

依传统观点,上述韵段属“文微通韵”,即韵字之间主元音相同而韵尾不同。白-沙(2014)为它们构拟了相同的韵尾(* -r),认为它们正常相押,无所谓“通韵”。白-沙(2014:264-268)进一步从汉代古读材料中推断: * -r > * -j为山东半岛附近的方言现象, * -r > * -n为西部地区的方言现象。李妍周、沙加尔(2013[1998]:20)还在白语的早期借词层中观察到了后一种音变。

3.3.4 词尾和后缀

Baxter(1992)认为上古汉语是一种无声调语言,他采纳了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蒲立

^⑫ 江有诰的观点参见《音学十书·卷首·寄段茂堂先生原书》、《音学十书·卷首·复王石隴先生书》,王念孙的观点参见《音学十书·卷首·王石隴先生来书》。

^⑬ Baxter(1992:332-333)还从类型学的角度推论上古汉语不具有浊塞音韵尾。

^⑭ 白-沙(2014:255)“晨”字未入韵,当为偶疏。按,江有诰《音学十书·群经韵读》“旗”字注“音芹”。

^⑮ 王力的构拟根据郭锡良(1986)《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Pulleyblank)等人的理论,认为去声来源于后置韵尾 *-s、上声来源于后置韵尾 *-ʔ。在此基础上,白-沙(2014)主要做了以下调整:1)将 *-s一律视为词缀,即认为具有一定形态功能;2)认为后置韵尾 *-ʔ只能出现在元音或鼻音韵尾之后,不能出现在塞音之后。

4. 小结

白-沙(2014)在民族语借词、汉语方言、古文字等新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将历史比较法运用到上古汉语前置成分和声母构拟中。该体系还吸收并完善了以往的构拟方案,包括小舌音声母、* -r 韵尾等。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更好地解释语音演变

该体系不仅为所有《广韵》声、韵类构拟了上古来源,还对早期汉语方言做了探究。白-沙(2014)主要探讨了两类古方言现象:一是 *-r韵尾在汉代方言中的分化(详3.3.3),二是原声闽语特殊声类的上古来源以及它们后来的分化过程。例如,该系统为原始闽语的浊送气声母构拟了紧致结合的“前置音节(除 * N-外)+浊塞/塞擦音”结构(* C.b^(ʰ)->* bh-),白-沙(2014:87)参照藏语方言和嘉戎语的情形,提出 * C.b^(ʰ)-在原始闽语中经历了两波清化音变;为原始闽语的清响音声母构拟了“前置清辅音+浊响音声母”结构(* C.r^(ʰ)->* lh-),白-沙(2014:91-92)参照类越南语和拉珈语的情形,分别讨论了清响音声母在闽北和闽南方言中的分化。

2) 具有可验证性

白-沙(2014:5)遵循“假说—演绎”法,认为构拟体系不仅要与音韵材料相符,还应当从中推衍出音变假说,使系统具备一定的预测能力,并接受新材料的检验。最近数十年来,不断丰富的出土简帛文献正是检验古音构拟的绝佳材料。白-沙(2014:208-209)利用传世的“三家诗”逸文,对“圆唇元音假说”做了检验;白-沙(2014:209-211)利用出土本《老子》,对“前元音假说”做了检验。我们也依据出土本《周易》,对“圆唇元音假说”的例外现象做了初步考察:

雅洪托夫(1986[1960]:69)曾发现《周易》有几处用韵与“圆唇元音假说”不符,但他无法解释,只好视为例外。例如:

(10)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周易·中孚·九二》)

依韵例,此处以“和”、“靡”为一韵,属传统的歌部。但根据“圆唇元音”假说,它们具有不同的主元音,各家的拟音如下^⑩:

表 10 各家对相关韵脚字的构拟

	和	靡	羸
中古音	hwa	mje	ljwe
高本汉	* g ^ʰ wa	* mia	* lwia
王力	* yua	* mīa	* lya
Baxter-Sagart	* G ^ʰ oj	* m(r)aj	* [r]o[j]

相较“《易》传”而言,《周易》经文(包括卦画、卦名、卦辞、爻辞)的产生时代较早,大致可追溯到西周时期,故将本韵段视为例外是可疑的。

^⑩ “和”、“靡”二字在《诗》韵中分别与合口字和开口字相韵:“和”字入韵凡 1 见:《郑风·蓍兮》首章(85.1)韵“吹”;“靡”字入韵凡 3 见:《王风·黍离》一、二、三章(65.1A、65.2A、65.3A)皆韵“离”。

目前整理发表的出土本《周易》主要有“上博本”、“汉简本”和“帛书本”三种,抄写年代大致集中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之间。其中,“上博本”和“汉简本”此处皆已残缺,而西汉早期的“帛书本”保存了异文^⑰:

(11)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羸[之]。(《周易·中复·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与尔羸之。(《二三子》)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又好爵,吾与尔羸之。(《繆和》)

可见,今本“靡”字在“帛书本”中作“羸”^⑱。根据白-沙(2014)，“和”与“羸”、“靡”分别在上古和中古早期阶段带有相同的主元音:

(12) 和 *ɣfoj > *hwaj > hwa

羸 * [r]o[j] > *ljwej > ljwe

靡 * m(r)aj > *mjaj > mje

可以推测,帛书本用韵反映了更早的语音状况,今本则形成于圆唇元音分裂之后。这时,歌部的*-j韵尾尚未丢失,“和”与“靡”音近而与“羸”较疏,遂导致传抄过程中产生异文。

“圆唇元音假说”、“前元音假说”、“*-r-介音假说”等是构拟“六元音”的重要基础(白一平,2010),音变假说得到验证,意味着拟音体系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3) 注重构拟的实用性

白一平和沙加尔两位先生公布了包含约 5000 条词项的构拟表格^⑲。除了给出上古拟音外,该表还标注了每个字的现代汉语拼音、中古音韵地位、基本训释、《汉文典》谐声序列等信息。此外,还提供了三种版本,分别按照音序、笔画和谐声序列编排,以满足不同需求。

顾炎武曾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音学五书·卷首·答李子德书》)在今天,汉语史各学科仍离不开上古音拟测,作为一项先进、实用的体系,白-沙(2014)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 白一平 2010 《关于上古音的四个假说》,潘悟云主编《境外汉语音韵学论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
- 董同龢 1948 《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集刊》,18本1分。
- 高本汉(著) 赵元任(译) 1923/2002 《高本汉的谐声说》,《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高本汉(著) 潘悟云等(译) 1940/1997 《汉文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 李妍周 沙加尔(著) 徐世璇(译) 1998/2013 《从白语中的汉语词汇看借词的无限制性》,载向柏霖、蓝庆元主编 2013。
- 米可(Alexis Michaud)(著) 衣莉 林幼菁(译) 2013 《单音节化:东亚语言中的一些常见演化形式》,《茶马古道研究期刊》第3期。
- 潘悟云 1997 《喉音考》,《民族语文》第5期。

^⑰ 分别见于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14、19、44页。

^⑱ 据我们考察,“羸”字在今本《周易》经文中凡4见。从诸家的训释来看,“羸”字有“缠绕”、“困顿”、“牵连”等义项,与“绳索”、“藤蔓”、“藩篱”等事物相关。联系“羸”字在《周易》中的用例,我们认为今本“靡”应当从朱熹、王夫之等释为“系属”,“吾与尔靡(羸)之”反映了“君臣相应”。具体论述请参看拙文《〈周易·中孚〉“吾与尔靡之”考论》(待刊)。

^⑲ 下载地址为: <http://ocbaxtersagart.lsa.umich.edu>。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裘锡圭 2004 《释郭店〈缁衣〉“出言有信，黎民所训”：兼说“丨”为“针”之初文》，《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 沙加尔 白一平 2010 《上古汉语的 N-和 m-前缀》，《汉藏语学报》第 4 期。
- 邵荣芬 1991 《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第 20 期。
- 斯塔罗斯金(著) 林海鹰等(译) 1989/2010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力 1958 《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
- 王力 1989[1963] 《古韵脂微物质月五部的分野》，《王力文集》第 17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力 1987 《汉语语音史》，《王力文集》第 10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 向柏霖 蓝庆元(主编) 2013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商务印书馆。
- 雅洪托夫(著) 陈重业(译) 1986[1960] 《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唐作藩、胡双宝编《汉语史论集》。
- 曾晓渝 2003 《见母的上古音值》，《中国语文》第 2 期。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1994 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4.3.
-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Sagart, Laurent and William H. Baxter 2009 Reconstructing Old Chinese uvulars in the Baxter-Sagart system (version 0.99),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38.221-244.
- Sagart, Laurent and William H. Baxter 2012 Reconstructing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29-59.

马坤 广州 中山大学中文系 9filippo@gmail.com

桂诗春教授逝世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桂诗春教授，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凌晨 2 时 27 分在广州逝世，享年 88 岁。

桂诗春先生，陕西西安人，1930 年 2 月出生于广州，1950 年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随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1955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留校任教，1970 年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曾担任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语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委员会会长和广东外语学会会长。

桂诗春先生毕生致力于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探索，主要研究领域是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外语测试、语料库语言学、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是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主要创始人。20 世纪 80 年代，主持英语标准化考试试验并推广至全国，一生笔耕不辍。著有《心理语言学》《标准化考试——理论、原则、方法》《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语言学方法论》等。

对桂诗春教授的逝世我们深表哀悼！

中国语文编辑部
2017年5月10日